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德國外交政策取向及其對兩岸關係

German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doi:10.30390/ISC.199710_36(10).0001

問題與研究, 36(10), 1997

Issues & Studies, 36(10), 1997

作者/Author：湯紹成(Shao-Cheng Tang)

頁數/Page：1-1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10_36\(10\).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10_36(10).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德國外交政策取向及其 對兩岸關係

湯 紹 成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副研究員)

摘 要

一九九〇年德國的統一，意味著德國完全的獨立自主，不再受到盟國的制約，而德國領土向東擴張，其綜合國力更是增強不少。因此，德國政府正在重新調整其對外關係，而歐盟、美國與東歐，還是德國最重要的外交利益所在。同時，德國也在尋求一個新的國際地位，比如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爲常任理事國。

另外，國家的統一與獨立自主，更增加了德國人民對於國際人權問題的關心。去年在德國舉行了一場西藏研討會，以及隨後德國國會通過支持西藏自決的決議案，這使得波昂與北京的關係一度跌入谷底。後因德方的道歉與認錯，雙方關係不久恢復正常。雖然如此，基於中共對於我國在外交上的牽制與打壓，使得德國政府始終未能改善與我國的關係，雙邊關係維持低調。以目前情況觀之，德國這種不平衡的兩岸政策，在短期間內，尚無改變的跡象。

關鍵詞：德國外交政策、德國與中共、德國與中華民國

* * *

壹、前 言

二次大戰以後，德國分裂爲二，西德受到美、英、法三國盟軍的占領，東德受到蘇聯的控制。雖然自五〇年代中期，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後，已具有相當的獨立自主權，但是，由於西德始終堅持國家統一的政策，以及四個盟國始終保留了對於德國統一的最後決定權，使得波昂政府的外交政策處處受到箝制，因而表現得比較保守。^①

註① William E. Paterson, "Beyond Semi-Sovereignty, The New Germany in the New Europe," *German Politics*. Vol. 5, No. 2 (August 1996), p. 167; 德國前外長 Hans-Dietrich Genscher, *Deutsche Aussenpolitik* (Stuttgart: Verlag Bonn Aktuell, 1997), pp. 15~42; H. - D. Genscher, *Deutsche Aussenpolitik* (Stuttgart: Verlag Bonn Aktuell, 1981), pp. 306~332.

正當八〇年代末期，東歐國家非共化的演變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德國也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當中統一了。統一後的德國，在各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問題，這是否會影響德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其外交政策正向什麼方向調整？德國對大陸的政策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德國與我國的關係是否也有所變更？其原因為何？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貳、德國的外交政策取向

一九九〇年德國的統一，這乃意味著德國真正的完全獨立自主，不再受到四強的制約。^②同時，德國的領土東擴，其國力正因政府大力援助德東地區而在重整，德國整體的發展潛力也已增強許多。^③因此，要探討統一後的德國外交政策，可從其國內基本條件的變更，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新的國家利益來加以剖析。

一、基本條件

統一後的德國，最明顯的改變，就是領土由二十五萬增至三十六萬平方公里，在歐洲聯盟十五個會員國中位居第四位，人口也由六千萬增至八千一百萬，居歐盟之冠。在歐洲經濟普遍並不十分景氣的情況下，德國去（一九九六）年仍約享有約一·四%的成長率，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兩萬三千餘美元，僅次於盧森堡與丹麥，居歐盟第三，但是，國民總生產毛額二兆美元，居歐盟之冠，因此，這也更增強了原本就是西歐最大強權的影響力。^④

雖然德國今年初的失業率高達一二%，失業人口也創下戰後的新高點四百八十萬人，德國還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貿易國，歐盟的最大支付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二大支付國，以及聯合國第三大支付國。因此，德國的這種優越的條件時常會讓人感到懷疑，到底德國是歐洲的德國，還是歐洲是德國的歐洲？^⑤

註② 依照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二日美、英、法、蘇以及兩德所簽訂的「二加四條約」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統一的德國將獲得對內與對外完全的主權。見 *Die Verträge zur Einheit Deutschlands* (Mue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p. 33; 另比較 Karl Kaiser, *Deutschlands Vereinigung: Die internationalen Aspekte* (Bergisch Gladbach: Bastei Luebbe, 1991), pp. 52~58; Gottfried Niedhart,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m Teilstaat mit begrenzter Souveranitaet zum postmodernen Nationalstaat,"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1-2/1997, pp. 15~23.

註③ 湯紹成，「德東地區的經濟問題」，*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二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二年八月，頁六三~七一。

註④ *Harenberg Lexikon der Gegenwart 1997* (Dortmund, Harenberg Lexikon Verlag, 1996), p. 424以及首頁圖表; Bulletin,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Bonn), Nr. 10 (Jan. 31, 1997), pp. 99~100.

註⑤ Matthias Zimmer, "Return of the Mittellage? The Discourse of the Centre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German Politics*, Vol. 6, No. 1 (April 1997), pp. 23~38; Daniel Vernet, "Europaeisches Deutschland oder deutsches Europa? Deutsche Interessenpolitik in Europa," *Internationale Politik*, Feb. 1997, pp. 15~22;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版D四。

德國現任政府是一九九四年十月份選舉後所組成，它是由總理科爾（Helmut Kohl）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與基督教社會聯盟（CDU/CSU）以及自由民主黨（FDP）的聯合政府，目前政治狀況尚稱穩定。這主要是因為執政黨內部運作順暢，其政策多獲民衆認同，同時最大的在野黨社民黨（SPD）缺乏吸引人的議題，以及內部分裂等情況所造成。而柯爾總理自一九七三年開始擔任基民黨主席至今已二十三年，去年十月他第十三度連任該黨黨魁，在黨內可以向他挑戰的人都已被他打垮，其地位十分穩固。同時，他自一九八二年主政至今，已第四度連任總理，前後總計十五年，是德國戰後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理，而且他也還在日前宣布，將於一九九八年繼續競選第五度總理。^⑥

在國際方面，自統一以來，幾項區域性的危機，提供德國積極重新參與國際爭端的機會，同時德國也開始尋求它在國際上新的定位。首先經由一九九一年中東海灣戰爭時西方各國的敦促，波昂政府以經援的方式介入。之後，德國還在聯合國的指揮下，直接參與了南斯拉夫內戰以及中東和平的協調事務等等。^⑦

為因應國家的統一以及後冷戰時期新的國際情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於一九九四年中作出判決，^⑧同意德國的聯邦軍（Bundeswehr）可以在聯合國以及西歐聯盟（WEU）等國際組織的範圍內，一同參與國際行動。這項判決改變了德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基本法禁止向外派兵的限制，無形中增加了德國在國際間揮灑的空間。

基於德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負擔相當義務的實況，德國外長金格爾（Klaus Kinkel）於去年聯合國大會上，再度提出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議案。^⑨德國政府認為，多年來德國是聯合國第三大支助國，承擔該組織八·九三%的預算，一九九六年總計為五億六千萬馬克。不僅如此，德國政府近年來，也不斷積極參與上述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已盡相當的國際義務，這也是多半西方國家所企求的。

因此，金格爾外長認為，統一後的德國完全具備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條件。但是，為了顧及平衡原則，亞洲的日本甚至印度，以及中南美洲的巴西是否同時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呢？而屆時常任理事國增加，是否將會影響安理會的議事效率？所以，德國的訴求一直未能解決，身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共，因對於新會員國的加入擁有否決權，自然對於德國政府的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註⑥ *Internati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4, 1997, p. 12.

註⑦ Wilfried von Bredow & Thomas Jaeger,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 Nationale Interesse i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laden : Leske + Budrich, 1993), pp. 73~81.

註⑧ Michael Kreile, "Verantwortung und Interess in der deutschen Aussen-und Sicherheitspolitik,"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5/1995 (Jan. 26, 1996), pp. 10~11.

註⑨ Tobias Deibel & Heiko Thomas, "Was kostet die Welt? Deutschlands Draengen in den Sicherheitsrat," *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97, pp. 178~179; Wilfried von Bedow & T. Jaeger,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pp. 17~26, Hans Arnold, *Deutschlandsgroesse : Deutsche Aussenpolitik zwischen Macht und Mangel* (Muechen, Zueich : Piper, 1995), pp. 26~34.

二、國家利益與對外政策走向

世界各國的對外政策，都是各依其國家利益來制訂，同時也是以服務國家的利益為最高目的。因此，從德國的國家利益來分析，更能理解德國對外政策的梗概。依照一九九四年德國政府「安全與國防政策白皮書」的看法，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主要的利益有以下幾項：^⑩

(一)維繫德國人民自由、安全與福祉以及國家領土的完整，

(二)與歐洲聯盟整合，

(三)與美國的關係，

(四)與東歐鄰邦的關係，

(五)維繫以國際法、人權與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世界經濟秩序。

與歐洲聯盟的關係是德國外交政策當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為德國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與九個國家為鄰，是俄羅斯以外全歐洲地區鄰邦最多的國家。其中只有波蘭、捷克與瑞士不是歐盟會員，而前兩國也將在幾年內加入歐盟。基於歷史的原因，德國曾在歐洲掀起兩次大戰，造成歐洲各國重大的傷亡。但是，若有一個整合程度既深且廣的歐洲聯盟來維繫歐洲各國的關係，在歐洲再度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會相對降低。對於這個立論，不但柯爾總理堅信不移，同時「功能理論」也可加以佐證。^⑪

此外，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是依賴出口，而其中六〇%又是來自與歐盟各國的貿易，每四個就業人口當中，就有一個與出口有關。因此，德國特別依賴與歐盟良好的政治關係以及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⑫再者，德國與歐盟的關係也可以用相得益彰來形容。一方面，德國必須以歐盟為依托，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論是歐洲政治聯盟與經濟聯盟，或是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為常任理事國等政策，德國都需要歐盟各國的支持與協助。另一方面，歐盟也可以基於共同的利益與德國的力量，對外

註⑩ Christian Hacke, "Die neue Bedeutung des nationalen Interesses fuer d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B1-2/97 (Jan. 3, 1997), pp. 7-8. 裁軍、限武以及反核子武器擴散等等問題當然也是德國對外政策的重點，但因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較小，故從略。

註⑪ 從德國東方的波蘭以順時針方向算起，德國的鄰國為：波蘭、捷克、奧地利、瑞士、法國、盧森堡、比利時、荷蘭與丹麥等九國。Thomas Banchoff, "German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Memory," *German Politics*, Vol. 6, No. 1 (April 1997), pp. 60-76; 有關「功能理論」可參閱兩本經典著作：D. A. Mitran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5); 以及同作者,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其主要論點在於：當國與國之間非政治性的關係發展越緊密，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就越低。

註⑫ Christian Deubn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und die Europaeische Gemeinschaft," Cord Jakobeit & Alparslan Yenal, eds., *Gesamteuropa: Analysen, Probleme und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 Schriftenreihe Band 317* (Opladen: Leske + Burich Verlag, 1993), pp. 393-413.

增強其實力，而波昂政府也希望藉此減輕其他歐洲國家對於強大的德國的疑慮。因此，歐盟可說是德國對外政策當中最重要的一環。

從長遠看，多數德國政經學界人士都認為，歐盟的經濟與貨幣聯盟不但可以更加增進各會員國之間的財經關係，同時還能給德國帶來穩定的經濟成長，以及增加就業機會與國際競爭力。^⑬因此，德國政府對於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推動，不遺餘力。德國政府近日曾宣布，全力推動歐洲一體化，特別是按照計畫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實現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是德國當前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

其次，基於地理與歷史的因素，德國與東歐各國的關係，都比其他西歐國家與這些新興民主國家的關係更加緊密。因此，自東歐各國非共化以來，德國政府更是以其先進的科技與雄厚的資金，有計畫地發展與該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除了投資以外，直接的支援更是受到東歐國家的歡迎。目前德國對於該地區國家的援助金額，已經超過所有其他歐盟國家的總和，對於該地區有極大的影響力。^⑭相對的，該地區的興衰治亂，比如跨國犯罪與走私以及難民問題等等，都將對於德國的安全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德國也一直希望能將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等幾個比較先進的東歐國家納入北約以及歐盟，以便於應付危機的狀況。

在德美關係方面，基於戰後美國對抗東歐的戰略考量，德國的分裂以及其第一線的地理位置，與美國的關係密不可分。後冷戰時期，美國盼能以德國來牽制法國甚至歐盟，而德國也希望藉美國來提高其國際地位，因此，雙方都希望能保持良好的政經關係。在今年六月美國舉辦馬歇爾計畫五十週年紀念會時，德國總理柯爾還親自赴美與會，並盛讚美國當年對於歐洲復興所做的偉大貢獻。^⑮雖然如此，德國與美國也因雙方戰略利益的改變，而關係正在疏遠。如前所述，德國當前最重要的政策是歐洲整合以及處理德國統一後的問題，而美國則將其政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以及國內經濟問題。^⑯

至一九九四年為止，美國一直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德國對美出口佔其總出口

註^⑬ Kenneth Dyson & Kevin Featherstone, "EMU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in Germany," *German Politics*, Vol. 5, No. 3 (December 1996), pp. 325~355; Nicklas Reinhardt, "A Turning Point in the German EMU Debate: The Baden-Wuerttemberg Regional Election of March 1996," *German Politics*, Vol. 6, No. 1 (April 1997), pp. 77~99.

註^⑭ C. Brands von Maarten, "Ueberfoederung durch Machtzunahme? Deutschland als integrierende oder zentrifugale Kraft," *International Politik*, 2/1997, p. 39; Krzysztof Skubiszewski, "Deutschland: Anwalt Mitteleuropas. Eine polnische Sicht der deutschen Europa-Politik," *International Politik*, 2/1997, pp. 29~33; Karsten D. Voigt, "Die Ostweiterung der NATO,"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5/1996 (Jan. 26, 1996), pp. 21~28; Patricia Davis and Peter Domdrowske, "Appetite of the Wolf: German Foreign Assistance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erman Politics*, Vol. 6, No. 1 (April 1997), pp. 1~22.

註^⑮ 星島日報，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日，版A三；*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9, 1997, p. 1, 6.

註^⑯ Charles Weston, "Key US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ussenpolitik (Germ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48, No. 1 (1997), pp. 49~57.

的七%，美國在德國的投資，也佔美國對歐投資的一半左右。為進一步加強德美雙方的關係，德國提出改善雙方關係的倡議，希望不僅以軍事合作而應該積極建立新的經貿關係，因此，波昂政府還提出一個以發展北美與歐洲之間自由貿易為主的跨大西洋共同體。

在德國與俄國的關係方面，統一後的德國領土東擴，在地緣上更靠近俄羅斯。雖然冷戰時期蘇聯的威脅不復存在，但是，俄國政局的安定，對於德國的安全有決定性的影響，比如共產黨勢力擴大而形成動亂的威脅，核子武器擴散的危險，以及與東歐國家相似的走私、難民以及跨國性組織犯罪對於德國的危害等等。因此，波昂政府積極支持葉爾欽政府，同時，也盡量避免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向東擴張，來刺激俄國。

去年二月下旬，柯爾總理赴俄國訪問三天，他是葉爾欽總統宣布競選連任的第一位來訪的外國政府首領，各方媒體都認為，這是德國明白表示對於葉爾欽的支持，因為，柯爾除了見葉爾欽以外，並未會見其他候選人。

在這次的訪問之中，雙方談論的重點還是北約的東擴問題。^①因為在這一問題上，原先俄羅斯的立場堅定，毫無妥協的餘地，俄方並且警告，若北約一旦東擴，歐洲將恢復冷戰期間的對峙，因為許多企盼加入北約的國家都有反俄情結。雖然如此，德國政府還是認為，加入北約是各主權國的權利，雙方歧見明顯，但終於在今年七月達成協議，北約十六國同意波蘭、捷克與匈牙利三國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北約五十週年時加入。^②

依照上述的分析將可以理解，去年底德國總理柯爾在一年一度接見外交使節團的講話中，以其先後的順序與著墨的程度，排列了德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③首先是歐洲聯盟，不但位居首位，而且著墨最多。其次是波蘭、中東、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俄羅斯與烏克蘭、南斯拉夫內戰、歐洲安全組織（OSCE）其後才是亞洲與太平洋地區。

依照柯爾總理的看，亞太地區對於德國政府的重要性，只優於拉丁美洲與非洲。在提及亞太地區時，柯爾總理只提到他去年所訪問的印尼、菲律賓與日本等國，以及此地區高速的經濟成長，與應該加強對此地區的雙邊關係等等。整篇講話當中，未曾提到中國大陸，柯爾的這種態度值得進一步探討。

註① Karsten D. Voigt, "Die Osterweiterung der NATO,"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5/96 (Januar 26, 1996), pp. 21~26.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9, 1997, p. 1, 6, 10; July 10, 1997, p. 1, 6, 10; July 11, 1997, pp. 1, 7.

註③ "Jahresempfang fuer das Diplomatisches Korps: Ansprache des Bundeskanzlers am 4. Dezember 1996," *Bulletin*, Nr. 100, S. 1081, Bonn, den 9. Dezember 1996.

叁、兩岸在德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在政治上，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結束，因而沒有留下歷史的包袱。①在五、六〇年代，由於東德與中共政權相互的正式關係，使得西德政府對於北京保持相當的距離。但是，西德政府為了不開罪這個亞洲的大國，因而始終拒絕與我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只保持經貿與文化上的往來。自一九七二年北京與波昂政府正式建交之後，雙方的關係突飛猛進，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雖然是雙方關係的一大挫折，但自九一年底起，雙方關係再度正常化。②

在經濟方面，基於東亞地區經濟高度的成長，已提供德國在外貿以及工業方面相當的動力。但是，與英、法、美國與日本等國相比較，德國在亞洲的市場佔有率仍然偏低。因此，德國早在一九九三年即提出「對亞洲政策綱要」，進一步發展與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一九九六年三月在曼谷所舉行的「亞歐高峰會議」，就是歐盟推展與亞洲關係的第一步，作為歐盟最重要成員國的德國，自然將不斷增進與本地區的關係。

由於德國的完全自主，以及正在國際上尋求一個新的角色，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仍須節制。一九九六年中共與德國之間，產生了不小的齟齬，其原因主要是圍繞在中共的人權問題上，其官方態度雖然軟弱，但是民間與媒體的態度十分強硬，這是否意味著民意將導致政策的改變？

一、德國與大陸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的陰影，始終還留存於不少德國人心中。比如一九九四年李鵬總理訪問德國時，就被德國民眾以人權問題向他表示抗議，因而使得李鵬在訪問期間中斷了預訂的行程，導致雙方尷尬的場面。③此外，當去年六月份，慕尼黑市政府將舉辦已籌畫一年多的「中德文化週」活動時，④北京當局斷然拒絕已經準備出發的中共演藝人員出國，造成此次活動的流產。其原因主要就是中共方面事前發現，主辦的慕尼黑市政府與歌德學院等機構，也想藉此次活動邀請大陸異議分子舉辦座談會。由此可見，中共當局對於人權問題的敏感與堅持。

註① Tang Shaocheng, *Deutschlandbilder Chinas von 1870 ~ 1989 :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Perzeption der VR China zur deutschen Frage* (Frankfurt/M, Berlin u. a. : Peter Lang, 1993) , pp. 65~69.

註② Kay Moeller, "Germany and China : A Continental Temp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7 (September 1996) , p. 718.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6, 1994, p. A19; 明報，一九九四年七月六日，版A十；*China News*, July 5, 1994, p. 6.

註④ Oskar Weggel, "Deutsche Chinapolitik-Ueberlegungen im Zeichen der Krise," *China Aktuell*, June 1996, pp. 598~599.

幾乎在同一時間，也就是去年六月十四至十七日，德國親自由民主黨（FDP）的諾曼基金會（Friedrich Naumann-Foundation），在波昂舉行有關西藏問題的研討會，導致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④德國自民黨自一九六九年與社民黨（SPD）組織聯合政府，自一九八三年更換聯合伙伴至今，一直與基民社聯盟聯合執政。^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六九年，自民黨雖然更換聯合執政的伙伴，但是一直主掌德國外交部，而諾曼基金會是自民黨的外圍組織，對於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在籌備西藏問題研討會時，德國外交部曾同意諾曼基金會所申請的大額經費。可是，在中共的壓力之下，外交部曾與主辦單位協商，希望他們不要以西藏流亡政府及流亡國會的名義，共同舉辦此項活動。雖然德國外交部與諾曼基金會同屬自民黨，但是，以自由主義為圭臬的諾曼基金會不接受此項建議，德國外交部因而拒絕給付約佔總經費四分之三的二十九萬馬克津貼，企圖使之流會。可是，基金會相對以募款方式湊足資金，並如期順利舉行會議。

此次共有全世界六十個國家的二百五十名西藏流亡分子，與德國政、學界人士，一同在波昂聯邦國會大廈的會議廳參加這次會議。在會議結束時還特別發表聲明，其中強烈要求北京政府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⑥這次會議不但造成德國外交部與諾曼基金會的齟齬，同時也引起德國政府與在野黨激烈的辯論，其主要的問題是：在德國的中共政策中，到底是國家的經貿利益還是基本人權的價值比較重要？

此次會後不久，德國聯邦議會各黨團還一致於六月二十日，又通過一項指責北京迫害西藏人權以及支持西藏人民自治（Autonomy）的決議。這項決議使得中共當局為之震怒，認為這是德國政府干涉中共內政，並立即以關閉諾曼基金會駐北京辦事處，以及取消德國外長金格爾七月份訪問大陸的既定行程做為報復。^⑦雖然如此，波昂政府也還是以國會自主以及政府無法干預諾曼基金會的活動為由，反駁北京的立場，北京與波昂之間的關係因而受到近年來最嚴重的挫折。

直至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外長錢其琛與德國外長金格爾，在紐約參加一年一度聯合國大會時舉行會談，^⑧雙方關係才有所轉圜，其中以政治與經濟的因素，為雙方主要的考量。由於中共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非經中共首肯，德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這個願望無法實現，因而造成德國政府對於中共的妥協態度。

在經貿關係方面，自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之間中共與德國的貿易額，要比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增加一倍多。一九九五兩國的雙邊貿易高達三〇〇億美元，相當

註④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ne 5, 1996, p. 4.

註⑤ 雖然自民黨在一九九四年的國會選舉中只占六·九%，但因兩大黨基民黨與社民黨都未能過半數，所以自民黨仍能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請參見：Juergen W. Falter and Juergen R. Winkler, "Die FDP vor dem Aus?"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6/96 (Feb. 2, 1996), pp. 45~53.

註⑥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ne 21, 1996, p. 10.

註⑦ *Das Parlament*, Nr. 27 (1996. 6. 28), pp. 6~10; Nr. 28 (1996. 7. 5), pp. 7~9.

註⑧ Oskar Weggel: "Aussenminister Kinkel in China," *China Aktuell*, Oktober 1996, p. 973.

中共與歐聯貿易的三分之一，其成長率接近二〇%。雖然此貿易額目前對德國而言並不算多，但是大陸市場的潛力，卻是不可限量，尤其在中共第九個五年計畫（一九九六～二〇〇〇）當中，德國在基本建設、環保、電子資訊、機械製造、汽車以及化學等方面，仍可佔有相當的優勢。

因此，金格爾曾在紐約向錢其琛做出承諾，保證德國政府施行一個中國政策，而且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德國將不會干涉中國內政。此外，雙方還強調，雖然在人權問題方面仍存有相當大的歧見，可是雙方不採取相互對抗的態度，反而相互尊重以及繼續對話。不久，金格爾終於在十月下旬順利訪問北京，由金格爾在大陸的行程，可以略悉中共與德國關係的重要性。^②

金格爾除了在北京與錢其琛會談以外，還會見了總理李鵬與國家主席江澤民，雙方都一再強調，不要以人權問題相互對抗，而應該著眼未來。金格爾再度強調，德國政府嚴守一個中國政策，其中包括西藏與台灣。此次會面氣氛十分融洽，雙方都展現了恢復友好的誠意，同時也為德國總統賀左格（Roman Herzog）十一月份訪問大陸做好了準備。第三天，金格爾轉往成都，為德國政府興建在大陸第三個領事館進行準備工作，因為德國有不少機械與鋼鐵公司參與了三峽大壩的工程。十一月下旬，德國總統賀左格訪問北京後，雙方關係再度恢復正常。

二、德國與中華民國

在與我國的關係方面，近年來，雙方政治關係方面實質的進展有限，除了雙邊的經貿關係以外，這主要是因為德國必須仰中共的鼻息，才能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擔任常任理事國。因此，德國政府對我國盡量保持低姿態，並堅拒售我國防武器，以免開罪北京。兩年以前，我國政府計畫向德國購買潛艇，這筆一百二十億美元的合同，將可挽救北德奄奄一息的造船業，但是波昂政府始終堅持原則，反對到底。基於上述理由，近年來我國與德國在政治關係方面，雖有駐德辦事處位階的提升，雙方定期舉行經濟部長會議，以及雙方官方往來形式對等化等等的發展，但是，實際上的改善仍然有限。^③

在去年二、三月我國總統大選期間，德國官方不但未發表支持我國的言論，反而在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商展中，以中共要員到訪為由，要求我國參展廠商拆除場內我國的國旗與國號，由此可見波昂政府對於我國所採取的保守政策之一般。^④但是，如果交涉已久的捷運或高鐵的合同成交，其金額將在數千億台幣以上，這對於雙邊關係的

註^② 明報，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版A六；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版A二，A十；*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2, 1996, p. 4.;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版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3, 1996, p. 4.;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版A二；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版一，版四；大公報，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版A四。

註^③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六日，版九；聯合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七日，版三十九。

註^④ 聯合報，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九日，版四。

改善，必有相當助益。

然而，在同一時期，德國的國會與輿論界對我國則十分支持。去年德國訪賓之中以國會副議長賀熙（Burkhard Hirsch）的位階最高。賀熙於我國大選後不久，便率領一德國國會議員訪問團抵台訪問，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的理性與冷靜推崇有加。^②在輿論界方面，根據新聞局駐德辦事處的統計，自去年一月至三月份，德國報刊共有二千三百篇有關臺灣的報導，主題含括：兩岸主權之爭、臺獨問題、總統直選與兩岸關係等等，其深度與廣度前所未見，^③而且立場鮮明，一致支持中華民國。

在經貿關係方面，歷年來德國為我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一九九五年中德貿易額有九十五億美元，^④較前一年增長一八·五%，但我方享有逆差十八億美元。一九九六年一月至五月，雙方貿易額約二七億美元，預計至年底將可超越一百億美元，^⑤同時德國十分看好我國在東南亞市場的潛力。去年，德國賓士集團旗下之DEBIS金融業結合馬來西亞玉波集團來台投資金融貸款業務，主要是汽車貸款。^⑥德國航太（DASA）則積極與我國的研華科技、台中精機、野力等廠商合作投資個人電腦的控制器，西門子與拜耳公司也打算在臺投資精密化學專業區。^⑦

德國自一九九〇年統一之後，其當務之急就是整頓德東的經濟。德國聯邦經濟部助理次長畢爾納（Werner Birner）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訪台，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促使臺商到德東地區投資。^⑧去年七月，德國經濟部次長碩勒士（Dr. Lorenz Schomerus）率工商領袖十人訪華，也再度為德東地區的投資環境作宣傳。^⑨另外，早自一九九二年起，我國與德國每年都舉行經濟部長會議，已建立了高層的諮商管道，並已達成多項協議，只因去年德國經濟部長身體有恙，而延遲至今年上半年訪華。另外，我國民間組織「中歐貿易促進會」，也曾於去年六月在漢堡舉行第三屆中德經濟合作會議，對於中德雙方加強經貿投資及技術轉移等方面，貢獻良多。我國在德國投資的企業，則以資訊、機械與紡織業居多，雙方在經貿方面的關係持續成長，而且並無特殊的困難與障礙存在。

綜上所述，德國政府處理中德關係的態度十分嚴謹與保守。德國政府堅持只與我國發展經貿等低層政治的關係，而國會的態度則比較靈活。據德國駐台經濟辦事處人員透露，整體而言，去年中德雙方的關係並無任何重大的進展，但是，他們希望今年能與其他歐洲國家以及歐聯同步，小幅度地改善與我國的政治關係。

註② 外交部資料；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二日，版一。

註③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八日，版一；工商時報，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版十三。

註④ 「德國」，經濟部資料，民國八十五年十月。

註⑤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民國八十五年六月，頁五七。

註⑥ 工商時報，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二日，版三。

註⑦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六日，版一。

註⑧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七日，版二。

註⑨ 國貿局資料；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版九。

肆、結 語

整體而言，在柯爾總理的領導之下，當前德國的內政情況尚稱穩定。在外交上，德國的地位日漸重要，雖然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擔任常任理事國的目的並非一蹴可幾，但是，德國以其強大的國力，以及擔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的意願與能力而言，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將不斷提升，而它也正在找尋其適當的國際地位。

以德國的外交利益而言，到底歐洲、美國與俄羅斯還是重點，因此，兩岸對於德國而言，其重要性有限。雖然德國民眾對於六四的印象惡劣，以及對於大陸的人權問題表現同情與支持的態度，但是，以德國政府的立場而言，維持與中共關係的平穩發展，還是比較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由此可見，德國人民與政府之間意見的差異，這也是國家利益優於道德原則的另一例證。

爲了不開罪中共，以免影響其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波昂政府在處理對我國的關係方面，則可以用「戒急用忍，堅持原則」來形容其近年來一慣的立場。德國政府對我國的政策顯現得十分軟弱，而且其外交手腕也顯現得比較僵硬，對於改善與我國的關係方面助益有限，雙邊關係維持低調。以目前情況觀之，德國這種不平衡的兩岸政策，在短期間內尚無改變的跡象與誘因。

*

*

*

